

韩礼德对转换生成语言学 若干观点和看法的看法

朱永生

一、引言

以韩礼德为代表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派和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转换生成语言学派是当今世界影响最大的两个语言学流派。相对而言 在过去的 40 年中 尤其是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至 80 年代初, 转换生成语言学在声势和影响上占有绝对的优势, 但在过去的 20 年中, 形势发生了变化。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地位逐步上升, 转换生成语言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经成为历史。

本文的重点是论述韩礼德对转换生成语言学若干观点和看法的看法。

二、如何看待“理想化”

韩礼德(1978)明确指出“,在任何一种语言研究或任何一种系统化的研究中,都含有理想化的成分。关键是我们需要尽可能地

将理想化的程度降低到最低限度，从而使我们了解交际的过程”。韩礼德认为 乔姆斯基的理论过于理想化 牺牲太大 放弃了许多不应该放弃的东西。他(1973)主张语言理论应该接近语言使用的真实情况 指出其中部分原因 是由于解决问题的方式可能取决于对真实使用的语言所作的研究，甚至当问题的解决不取决于这种研究时，与语言行为相关的各种特征有可能恰恰就是最容易被理想化过程抹杀的那些特征。”

在《语言学的研究目标和研究角度》(*Aims and Perspectives in Linguistics*)一书中 韩礼德 1977 再次就乔姆斯基‘理想化’的做法发表评论。他说：“在他们的心目中 儿童是在一种与周围环境完全隔绝的条件下学习语言的”，语言理论因此把社会情景及各种社会现象都排斥在外”这就意味着“排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以及语义的交换”。韩礼德明确指出“理想化就是心理化”。他认为 在语义与现实之间还有社会结构存在 而乔姆斯基把语言理想化，实际上就是有意回避语言与社会之间的紧密关系。在韩礼德看来，人们既可以把语言使用看作是个人内在的行为 (intra-action)，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interaction) 既可以通过研究个人的知识 (knowledge) 来解释互动，也可以通过研究互动来解释知识。据我们所知，这是韩礼德第一次如此明确地论述乔姆斯基所说的知识与他本人所说的互动之间的辩证关系。

根据我们掌握的文献资料 韩礼德对乔姆斯基‘理想化’所作的最近一次批评出现在 1998年写成但至今尚未发表的一篇文章中 题为“Computing meanings: some reflections on past experience and present prospects”。他的原话是：“Of course, we, as grammarians, had to learn to write our descriptions in computable form: that is, to make them fully explicit. This was an important exercise, from which we learnt a great deal. But to make them explicit is not the same demand as to make them

simple. Language is not simple. It is ferociously complex — perhaps the single most complex phenomenon in nature; and at least the general label ‘constituency’ is not a single, undifferentiated type of structure (like a ‘tree’), but a highly variable array of different meaning — making resources with highly complex interrelations among them. Unfortunately the linguists themselves had made the problem worse; the prevailing ideology, at least in America, but also perhaps in western Europe and in Japan, was the structuralist one deriving out of Bloomfield via Chomsky; and this was highly reductionist, in that, in order for natural language to be represented as a formal system, much of the rich variation in meaning had to be idealized out of the picture. But not only was it reductionist — it was also authoritarian; for linguists of this persuasion, the standard response to anyone who disagreed with them was, ‘Either your grammar is notational variant of my grammar, or else your grammar is wrong.’”从这段话中，我们清楚地看到，韩礼德不仅坚决反对“理想化”的思想和做法，而且对乔姆斯基学派惟我独尊的傲慢态度表示了自己的不满。

三、如何看待“形式化”

我们在上文指出，乔姆斯基把语言视为一整套规则，认为使用者只要掌握了这些规则，便能创造出无数符合语法的句子。他主张语言描写形式化，规则描写科学化。而韩礼德首先肯定“形式化”的积极作用，但同时又指出语言的实际使用不是仅靠几条规则就能解决问题的，因为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如言语活动参与者、交际的话题、场合、方式及目的等。在韩礼德看来，要真正反映语

言使用的实际，语言学家需要解决的问题应该是语言使用的倾向或盖然性 (probability) 即最为常见的交际模式。

我国学者申小龙 (1988: 234)对以转换生成语言学为代表的形式主义语言学脱离语言实际研究语言的做法提出过严厉的批评：“既然语言是人和世界相遇的中心点 那么语言的社会性、人文性才是语言的本质，而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在抽象化的同时舍弃了语言在人文方面的根本属性，这使得它无法贴近语言现实，更无法深入语言的本质层次。它的解释力必然是极其有限的。诚然，形式化描写具有明晰、规范、细致、严密的无可否认的优点 这对于语言分析是必要的。但如果对它的限度没有充分的认识，甚至将它异化为一种语言的本质，那么我们就永远无法理解语言。归根结底，我们难道是在找到了一种描写语言能力的理论或规则形式系统之后才对人类掌握自然语言这种能力有所理解的吗？还是我们只有有了一定的理解之后，才用理论和形式系统对它作出一定的解释？”申小龙不是韩礼德的门生，也说不上是韩礼德的忠实追随者，但他的上述观点的确以客观的态度指出了乔姆斯基“形式化”的局限性。

廖秋忠 (1996: 280—281) 在一篇比较形式主义与功能主义的文章中，对这两个学派各自的长处与不足作了精辟的论述：“形式主义除了在描写时强调形式化之外，还强调语言结构，特别是句法结构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功能主义并不排斥描写的形式化，但强调语言结构对功能等因素的依赖性。虽然绝大多数的语言结构就其产生的原因来看可能是出于功能上的考虑，但功能与形式之间的联系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就共时的角度来看，原来的功能与形式之间的联系可能已不明显或看不出来，人们已无法从语言的功能推导到语言的结构形式。因而，从共时研究的角度出发，语言的形式结构是可以单独研究的，只是在研究时不要过分强调语言结构的自主性而否认形式与功能之间的联系或否认功能的解释是一种

可能的解释。反过来说，功能主义者也要看到语言形式与功能之间相对独立的一面，不要一味夸大功能对形式所起的必然作用，从而使得功能的解释变得无所不能而无所能。这两种研究观点的学者们应看到他们的研究之间的互补性而不应相互排斥。”在我们看来 廖秋忠的这番话是公允的 实事求是的。

四、如何看待乔姆斯基所说的“语言能力”

众所周知 乔姆斯基区分“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而韩礼德区分“能做”和“做”前者指的是“语义潜能”即语言所具有的各种意义，后者指的是对语义潜能的实际应用，即语义的具体表达。由于乔姆斯基和韩礼德分别从心理和社会的角度研究语言，“语言能力”和“可能做”不是一回事。前者指的是讲话者主观拥有的语言知识，后者指的是语言中客观存在的所有意义。

乔姆斯基区分人的“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区分人的“语言能力”和“语言知识”并把语言能力的研究看作是语言学的根本任务。在谈到应当如何看待乔姆斯基有关语言知识和语言能力的区分时 韩礼德 (1978: 38) 说 有两种处理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接受这种区分，但研究语言能力而不是语言知识，建立一套能解释各种实际语言应用情形的“语言能力理论”这就是说 你在承认有语言能力的同时，也承认社会语言能力 (sociolinguistic competence) 的存在；第二种方法是彻底摒弃这种区分，换言之，对符合语法的 (grammatical) 语言现象和可以被接受的 (acceptable) 语言现象加以区分。韩礼德 (1973) 认为，功能语言学没有必要去研究讲话者的语言知识和语言能力。他明确指出：“如果我们坚持在讲话者所知道的和讲话者实际所做的之间划一条界线，我们就无法对讲话者所做的作出解释，只能使它看上去仅仅是从讲话者的语言知识中随意选择而得出的结果。”他 (1978) 还指出 如果一定要使用“语

言能力'这个术语就必须把它理解为'讲话者所具有的任何使用语言的知识'。

看到这一致命弱点的不仅韩礼德一人。美国的马提索夫(J. A. Matisoff)就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语言学家关心得更多的是如何使表述漂亮、精确、具有数学的严密性，而实际上不能忠实于所研究语言的精神实质，有时候语言材料是庞杂的，不规则的，或不匀称的，而生成语法又试图把一切都安排得井然有序，像数学那样精确。任何现象都有各种各样的例外。”

在我们看来，由于乔姆斯基把语言视为一种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可以绝对形式化的现象，他对语言能力的研究就不可能是全面的，也不可能是穷尽的。

五、如何看待语义在语言研究中的地位

乔姆斯基对语义在语言研究中的位置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前后不一致的。他在《句法结构》(*Syntactic Structures*) (1957) 这本书中明确指出：“语法是独立发挥作用，不依靠意义的”。这种“语法独立论”实质上是把语法视为纯形式的东西。他把意义比作头发的颜色，认为研究语法不需要研究意义，就像研究语法不需要了解讲话者头发颜色一样。他这种观点不久便遭到反对，反对者中有的是他的学生。卡茨(Katz)、雷科夫(G. Lakoff)、福德(Fodor)、波斯特尔(P. M. Postal)、麦考利(J. D. McCawley)、罗斯(J. R. Ross)和巴赫(E. Bach)等人认为，语义必须包括在语言学之中，研究语言不考虑语义就如同研究牛奶可以不考虑奶牛一样站不住脚。

乔姆斯基本人也发现他建立的语法规则并不能解释所有的句子结构，从而感到以前的观点过于绝对，应该进行修正。从《句法理论面面观》(*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这本书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修正。乔姆斯基（1965）明白无误地说：“事实上，我们没有必要作出句法考虑和意义考虑可以截然分开的假设。”他不再坚持语法独立的观点，不再认为先由句法生成深层结构，然后由深层结构进入意义，而是认为语法和意义共同发挥作用了。

韩礼德像其他所有功能主义语言学家一样，始终把语义研究看作是语言学的一个十分重要、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对乔姆斯基等形式主义语言学家忽视语义研究甚至摒弃语义研究的做法持反对态度。

六、如何看待用心理学的方法研究语言

众所周知，包括乔姆斯基在内的许多语言学家主张从心理和认知的角度研究语言的生成和理解过程。对这个问题，韩礼德认为自己没有必要采取这种方法，但并不一味反对，更不干涉别人这样做。他这种态度不仅反映在他对转换生成语言学研究方法的想法上，而且也适用于其他所有从事心理语言学研究的人，其中除了福塞特这样的把心理因素纳入语言研究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家之外，还包括海姆斯（D. Hymes）这样的既从社会角度又从心理角度研究语言的非系统功能语言学家。从这个意义上说，韩礼德不同于自己的研究方法，基本是采取宽容态度的。

这里有一点必须讲清楚。我们说韩礼德不一味反对别人用心理学的方法研究各种语言现象，但这并不是说韩礼德支持乔姆斯基把语言完全看成“机体内部”的现象。我们知道从索绪尔开始，对于“语言在哪里？——在里面还是在外面？”这个问题，语言学界一直争论不休。显然，乔姆斯基是主张从人体内部即从心理认知的角度研究语言，而韩礼德是主张从人体外部即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研究语言。在这一点上，韩礼德的观点始终是十分明确的，可以

说从来没有改变过。比较强烈的一次表态出现在他 1977 年出版的《语言学的研究目标和研究角度》一书中。在这本书中，韩礼德指出“人文科学不是内省的同义词”；近年来 理论语言学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内部作用上，排斥相互作用。从哲学的角度看，这种做法给语言系统的描写带来了一种特别的结果：语言使用的环境要么被排斥在外，要么被看作是一种静止的被动的因素。环境被当作解释语义而提供的一种带有装饰性的背景，而不是被看作语言使用过程和语言学习过程中的一种动态成分。”十分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篇文章中，韩礼德第一次承认，语言研究不能以人类的皮肤为界，要么只研究皮肤里面发生的现象和过程，即人类学习语言和使用语言的心理过程，要么只研究皮肤外面发生的现象和过程，即人类学习语言和使用语言的社会过程。他明确指出，研究语言，不仅要研究人的内部作用或人的知识，也要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即人的行为，从而论述了综合研究的必要性。下面是韩礼德本人用来说明这一观点而绘制的图表，从这份图表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内部作用和相互作用所要研究的不同内容，又能看到乔姆斯基使用的“语言能力”（competence）和“语言行为”（performance）这一对术语与韩礼德使用的“能做”（can do）和“做”（does）这一对术语之间的关系：

	System	Instance
Interaction (behavior)	behavior potential ("can do")	instantial behavior ("does") (= "performance")
Introaction (knowledge)	knowledge potential ("knows, i. e. can bring to consciousness") (= "competence")	instantial knowledge ("brings to consciousness")

七、 结 语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清楚地看到 韩礼德在语言性质、研究任务和研究方法等重大问题上与转换生成学派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需要指出的是 近 20 年来，两个学派中都有人接受或部分接受对方的观点和研究方法，从而使两个学派之间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在系统功能语法这一方，较早转向而且转得比较彻底的是赫德森（R. A. Hudson）。另一位骨干是福塞特（R. Fawcett）他在 20 年前也开始把心理认知因素纳入自己的功能语言学研究中去。在转换生成语法这一方，菲尔莫尔（C. Fillmore）的“格语法”对句子成分的格所作的分析与韩礼德对句子成分语法功能的分析相当接近。此外，还有一些人已经可以归入功能学派，因为他们采用的是语义学和语用学的方法研究句子结构内各种成分所发挥的功能（D. Crystal, 1987: 409）。但是，两派之间的鸿沟依然很宽。

尽管许多人都希望系统功能语言学家和转换生成语言学家能坐到一起 交换意见 论长道短 但令人遗憾的是 这种可能性至少在目前看来还是微乎其微。究其原因，除了学术观点本身差异很大之外 两派之间长期缺乏直接的沟通 也为双方的对话造成了难以跨越的人为障碍。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很难看到互相接近的迹象。

参 考 书 目

Berry, M. (1977a) *Introduction to Systemic Linguistics: I, structures and*

- systems. London; Batsford
- Berry, M. (1977b) *Introduction to Systemic Linguistics: II, levels and links*. London; Batsford
- Butler, C. S. (1985) *Systemic Linguistics: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London; Batsford
- Butler, C. (1989) *Systemic models: unity, diversity and change*, in *Word* (Vol. 40). New York; International Linguistic Association
- Chomsky, N. (1957) *Syntactic Structures*. The Hague; Mouton
- Chomsky, N. (1965)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Cambridge; MIT Press
- Eggs, S. (1994) *An Introduction to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London; Pinter
- Halliday, M. A. K. (1973) *Explorations in the Functions of Language*. London; Edward Arnold
- Halliday, M. A. K. & R. Hasan. (1976) *Cohesion in English*. London; Longman
- Halliday, M. A. K. (1977) *Aims and Perspectives in Linguistics*. Occasional Papers Number 1; ALAA
- Halliday, M. A. K. (1978)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 London; Edward Arnold
- Halliday, M. A. K. (1983) *Systemic Background*, in W. S. Greaves & J. D. Benson (ed.) *Systemic Perspectives in Discourse*
- Halliday, M. A. K. & R. Hasan. (1985) *Language, Context and Text: aspects of language as a socio-semantic perspective*. Victoria; Deakin University Press
- Halliday, M. A. K. (1985)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London; Edward Arnold
- Halliday, M. A. K. (1995) *Language and the reshaping of human experience*, in Bessie Dendrinos (ed.) *Proceeding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thens; University Of Athens Press

- Halliday, M. A. K. (1996) *Things and relations: Regrammatizing experience as technical knowledge*, in J. R. Martin & R. Veel (eds.) *Reading Science: Critical and Functional Perspectives on Discourses of Science*. London: Edward Arnold
- Halliday, M. A. K. (forthcoming, written in 1998) *Computing Meanings: Some Reflections on Past Experience and Present Prospects*
- Sampson, G. (1980) *Schools of Linguistic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Saussure, F. De (1993)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edited by Baly, C. & Sechehaye, A.;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Harris, R.) London: Duckworth
- Steel, R. & Threadgold, T. (ed.) (1987) *Language Topic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 (1989) 《系统功能语法概论》,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 胡壮麟, (1992) 《语篇的衔接与连贯》,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胡壮麟, (1997) “系统功能语言学活动近况” 载《语言的功能》(余谓深等主编)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 廖秋忠, (1992) “也谈形式主义与功能主义” 载《廖秋忠文集》北京: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申小龙, (1989) 《汉语句型研究》海口: 海南人民出版社
- 徐烈炯, (1988) 《生成语法理论》,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朱永生、严世清, (2001) 《系统功能语言学多维思考》,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视觉隐喻管窥

熊学亮

一、引言

隐喻既是形象的修辞格式，又是洞察和理解世界的认知手段，即人们组织生活所依赖的象征网络框架（Lakoff & Johnson, 1980）此外，隐喻还可以用来构建自然科学的理论模型（如气体分子的撞球模型、声光的波浪模型等，Jones, 1974）创造某种信仰体系来影响历史活动（Brown, 1987）甚至在社会制度的认识基础中起到关键的作用。

语言的隐喻性已为众人所熟知，而其他的交际手段也可以产生隐喻效果。许多文化把音乐隐喻（如协音）当作构建社会现实的手段（St. Clair, 1988）。隐喻甚至还可以是视觉性质的，许多汉字的形义联想就是典型的实例。此外，在一定空间话语领域中实施的手势语、中北美洲印第安文化中的“驱魔轮”（The Medicine Wheel），传递的都是典型的视觉隐喻（visual metaphor 以下统称为“视喻”）信息。又由于汉字表现的方式是二维视喻（即长与宽），手势语是三维视喻（长、宽、高）而驱魔轮因呈现某种地球曲率状

曲线，故是一种四维空间概念。

视喻的涉及面较广，不同的视喻实际上由不同的视觉概念领域中的形象思维所促动，其间涉及到的认知性质也互不相等。因此，想在一篇小文中包罗万象地穷尽视喻概念是不现实的，本文的目的只不过是尝试性地探讨视喻所涉及到的若干一般性质的基本概念。

二、视喻的符号学分析

科学的范式化 (Kuhn, 1970)或其他形式的理论创建，都有一个认识变异过程。该变异过程以简明的阐释性隐喻开始，为重新组织一对象领域提供一个宏观视角。这种情况在“科学革命”时期屡见不鲜，此刻人们用一种新的方式或新的辩证角度来审视科学事件。随着光阴的流逝，类似宏观视角被运用得愈加充分，个中涉及到的细节也愈加完善，故一度只是简单的知识组织方案，演变成了一种像似性隐喻，即具备图片细节性的事件描述。这种由简单宏观视角演变成某种复杂详细结局的认知演变过程，并非局限于语言隐喻的科学使用，在视喻使用中也屡见不鲜。 Gombrich (1963)认为，意象和符号都有意义并用不同的形式显现，视喻以视码或视觉标志为实体行使功能，激活某种艺术感觉或效果，故具有艺术价值，而视喻的解释则要以文化背景为依据。

比如 ,Gombrich (1963: 13) 把某种文化背景中对“红色”的使用当作视喻来处理。由于红色是火焰和血的颜色，故自然而然地演变成了“危险”或“暴力”的视喻(或象征)。Gombrich所举的其他视喻例子为：玩具马当真马骑，此时真马的感觉向玩具马转移；黄金是价值的视喻，象征贵族。

视喻以视感能力为基础。Dondis (1978)分析了视喻的内部结构，认为“光”、“色”、“线”、“质”等以及这些因素在特定视觉空

间中彼此之间的比例和位置安排，都可以在“视觉句法”（visual syntax）的范围内创造出“冲突”、“和协”等效果。比如，“点”是视觉的基本单位，“箭头”指向某一空间，“线”是形式的起点。此外，“圆”、“方块”、“三角”等形状的排列，“光度”与“颜色”和“质地”的有机组合，都可以创造视喻效果。

视喻效果	冲突	和协
组合状态	不稳定	平衡
	不对称	对称
	不规则	规则
	复杂	简单
	片段	整体
	变化	一致
	透明	不透明

由于视喻受重心和组合规律影响，在方块内对“点”的不同布局，可同时创造出平衡和不稳定的不同效果视觉。对同一组物体的不同安排，也可以导致片段和整体的不同结局。Dondis认为，眼睛总是倾向于从“复杂”中寻找“简单”，即产生“格式塔”效果，因而“视觉”成了产生和理解视喻的关键。

三、视觉思维结构

Salomon (1979: 9) 认为，通过阅读处理信息的方式和通过视觉思维处理信息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故视喻与印刷世界中的语言隐喻有本质的差异，用印刷文化（print culture）的方式来解释口头文化（oral culture）也就显得不妥。这是因为，西方知识界的传统

与中北美洲印第安口头文化的对立，产生的是不同的认知和意动经验。知识界人士较注重文字 而印第安人则倾向于视觉模式、形状、颜色、情态等。学校教育强调的是知识的获取 而家庭则倾向于理解和言传身教。前者采取的是分析形式，后者采纳的是关系形式，即以经验为基础的非结构性学习系统（TenHouten & Kaplan, 1973）。分析模型是串行的 强调的是理性和逻辑 而关系模型则与同意象并行表现的情感方面相连。难怪印刷文化涉及数学、科学和文学批评等方面 而口头文化则与绘画、音乐和舞蹈有关。两种文化的认知风格不一 所表达的隐喻就不等。

信息处理方式

	印刷文化	口头文化
认 知	分析方式	综合方式
信息处理	串行(线性)	并行(格式塔)
思 维	关系、逻辑	情感、空间
倾 向	数学、科学	艺术、音乐、舞蹈
表现方式	语言隐喻	视觉隐喻
文化方式	印刷、科技	口头表达、艺术

对于处于印刷和口头两种文化中的人来说，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方式转换问题。在家里 口头文化占上风 涉及到合作、以人为本、情感交流等 在学校 强调的是获取知识、独立解题、与同学互相竞争等方面。两种场合内的奖励方式也不同。尽管都是与人交往 家庭内的初步社会化和学校里的再社会化之间的差别 导致社会距离和异化。对西方传统背景中的孩子来说，修辞风格来自于亚里士多德和西赛罗的作品，而对口头文化影响下的孩子来说，驱魔轮及其强烈的视觉意象提供了生活的基本隐喻（Blair，

1975) 口头文化利用的是右半脑, 产生的是艺术、音乐和情感效果; 而印刷文化利用的是左半脑, 倾向于科学、数学和形式分析。而理想的文化应是双重认知性质的, 取决于与两个半脑相联系的技巧和能力的彼此平衡。

口头文化的主要特征是依赖视喻 视喻是人们象征信仰、组织知识的方式。比如, 分析印第安驱魔轮, 可以发现或揭示其作为文化认知载体的视喻性质。

四、视喻的修辞分析

修辞是思考世界的方式 与感知和描述认知结构有关 涉及到信息的表现方式。Brown (1987: 125) 认为 根隐喻 (root metaphor) 聚焦于某一特征方面, 从某一角度组建词汇表达, 故可以用其来洞察一种体系的结构。由于根隐喻也是认知性质的, 因此这种隐喻在组建知识的过程中也起着关键的作用 是修辞理论的基础。

典型的亚里士多德根隐喻是 “生长隐喻”(physis) 将这种隐喻映射到文章的修辞领域 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共性:

	生 长	修 辞
起始	生长的开端	文章的开端给出主题
形式变化	生长经历的各种形式	思路发生、扩展、变化、讨论的主干部分
终端	生长结束	文章结束、总结内容
原因或主旨	规律、统一、原因	主题、要旨、文章的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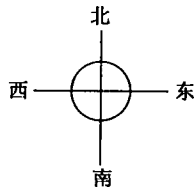
尽管两种模式都源于亚里士多德思想体系, 然而当代修辞学模式, 并非仅仅把生长隐喻和文章结构对应起来, 而是要认真考虑在文化认知领域内操作的 (隐性) 思维或认知框架, 因为还有其他

组织知识的基本修辞体系。

受亚氏体系影响的西方教师，在执教印第安学生修辞作文时，都面临下面这种困惑：这些学生的作文方式与亚里士多德的根隐喻或修辞格背道而驰，他们不是按入题、展现思想、终结这三步曲的方式写作 而是在中途突然转向 既无中心思想 也无连贯标志。他们的文章就像自行车钢丝所呈现的辐射圈，总是倾向于回到中心，然后再辐射到另一个方向。教师们还发现，印第安人写作时，使用太多的寓言和拟人表达 如“树和动物对自己倾诉感情”、“鸟儿留下口信和忠告”、“太阳拥抱我们”、“月亮打量着女人”、“花儿知道我们来了”等。由于沉浸在形象思维中，大人的写作充满着孩子气(Ramirez & Castaneda, 1974)。

五、驱魔轮的视喻效果

驱魔轮简图：



St. Clair (1985)对这一印第安族视喻进行过研究，发现它是一种连贯的象征系统，与西方中世纪艺术和当代广告的视喻有质的不同。该视喻实体上的轮圈 象征永恒的运动、宇宙、人生、生活方式等，视不同的印第安文化而局部相异。十字象征地球的四个方向，四种风向，自然的四种精神。可能人们会忽视这种出现在小孩绘画、服装设计、宗教偶像、静思符号上的似乎不太重要的文化艺术标志，然而它和根隐喻或西方传统的时代思潮有着同等的文